

莊子學史

第二册 (增补版)

方勇◎著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四编 隋唐庄子学

第一章 隋唐庄子学概说·····	3
第一节 隋唐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3
第二节 隋唐庄子学的发展过程·····	8
第二章 陆德明的《庄子音义》·····	14
第一节 《庄子音义》撰写因由及年代·····	14
第二节 对庄学源流及《庄子》版本的考述·····	16
第三节 对旧音义的兼收与审定·····	20
第四节 在旧音义外自作音义·····	25
第五节 对郭象本的校勘·····	29
第六节 《庄子音义》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33
第三章 成玄英的《庄子注疏》·····	36
第一节 依郭象注作疏解·····	36
第二节 在郭象注外作疏解·····	43
第三节 成疏的佛理化倾向·····	50

第四节 《庄子注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55
第四章 隋唐其他人的庄子学	59
第一节 魏徵等的《庄子治要》	59
第二节 文如海的《庄子正义》	63
第三节 张九垓的《庄子指要》	68
第四节 马总的《庄子钞》	72
第五节 李磻的《广废庄论》	77
第五章 隋唐佛教学者的庄子学	84
第一节 隋唐佛教学者对庄子思想的吸收与批评	84
第二节 宗密对庄子思想的批评与会通	95
第六章 隋唐道教学者的庄子学	102
第一节 隋唐道教学者对庄子思想的利用与阐发	102
第二节 司马承祯的《坐忘论》	115
第七章 隋唐文士的庄子学	123
第一节 隋唐学士文人对《庄子》的多所阐释	123
第二节 唐代的庄子寓言赋	131
第三节 李白的《大鹏赋》	144
第八章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所体现的庄子观	149
第一节 道论中的庄子观	150
第二节 心性论中的庄子观	161
第三节 修道论、经国理身论中的庄子观	168

第五编 宋元庄子学

第一章 宋元庄子学概说	179
第一节 宋元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179
第二节 宋元庄子学的发展过程	185
第二章 王安石的庄子学	201
第一节 王安石学术中的诸子学思想	201
第二节 《庄周》及其他文章所体现的庄子学思想	203
第三节 王安石诗歌中体现的庄子学思想	213
第四节 王安石庄子学思想的特征与影响	218
第三章 苏轼的庄子学	224
第一节 《庄子祠堂记》	224
第二节 《广成子解》	230
第三节 苏轼文艺创作所反映的庄子学	237
第四章 吕惠卿的《庄子全解》	247
第一节 《庄子全解》版本、名称及流转之概况	247
第二节 对儒道思想的调和	249
第三节 对《庄子》“指之所在”的探寻	266
第五章 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	273
第一节 略仿郭注体例而异其旨趣	275
第二节 对王安石庄子学思想的宗承与超越	280

第三节	对各篇作意与逻辑结构的用心探究	285
第四节	对庄子制名寓意的多所发微	291
第六章	陈景元的《庄子》研究	295
第一节	陈景元五种庄子学著作概说	296
第二节	陈景元庄子学思想的道教倾向	303
第三节	陈景元在《庄子》音义、考异方面多有贡献	312
第七章	苏门学士的庄子学	318
第一节	黄庭坚的庄子学	318
第二节	苏门其他学士的庄子学	328
第八章	北宋中后期其他人的庄子学	341
第一节	陈详道的《庄子注》	341
第二节	林自的《庄子注》	347
第三节	贾善翔的《南华真经直音》	355
第四节	李士表的《庄子九论》	358
第九章	林希逸的《庄子口义》	363
第一节	对旧注旧说的承因与批评	364
第二节	对庄子学说与儒学、佛理的大力整合	373
第三节	对《庄子》文字、笔法、意境的多所评析	387
第四节	《庄子口义》在中国、日本历史上的影响	395
第十章	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398
第一节	保存两宋治庄遗说十馀家	398
第二节	“管见”大抵以道家说解释《庄子》	402

第三节	“管见”对经文、传注的考校与审定	408
第十一章	罗勉道的《南华真经循本》	415
第一节	对《庄子》本旨的用心寻绎	415
第二节	执“化”字以寻绎《逍遥游》的义旨	424
第三节	创“二十六篇”说以修正苏轼的真伪观	430
第十二章	刘辰翁的《庄子南华真经点校》	434
第一节	对林希逸《庄子口义》的多所批驳	434
第二节	开创《庄子》评点之先河	441
第十三章	南宋至元代其他人的庄子学	447
第一节	程俱的《庄子论》	447
第二节	赵以夫的《庄子内篇注》	451
第三节	王应麟的《庄子逸篇》	455
第四节	黄震的《读庄子》	461
第五节	吴澄的《庄子叙录》	467
第六节	苗善时的《南华经公案》	472
第十四章	宋元佛道二教学者的庄子学	479
第一节	宋元佛教学者对《庄子》的援引与阐释	479
第二节	宋元道教学者对《庄子》的阐释与研究	494
第十五章	宋元理学家的庄子学	506
第一节	宋元理学家对庄子思想的吸纳与批评	506
第二节	朱熹对庄子及历代庄子学的论说	526

第十六章 宋元诗文词曲作家的庄子学	553
第一节 宋代散文诗词作家对《庄子》的援引与论说	553
第二节 元代散曲杂剧作家对《庄子》的多所阐释	572

第四编

隋唐庄子学

第一章 隋唐庄子学概说

第一节 隋唐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隋朝建立以后,统治阶级需要消除由南北朝长期分裂所带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现象,以便营造出一个适应于大一统政治局面的思想文化氛围。如据《隋书·儒林传》载,隋文帝杨坚一登皇位,乃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从中选取一些儒士充任官员,这便是他积极主张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但从隋文帝在位的整个时期来看,儒学在儒、道、释三教中的实际地位却可说是最低的。因为隋文帝一开始虽然主张以儒学作为立国的根本,但就他的内心而言,却十分信奉佛、道二教。据《隋书·高祖纪》等载,隋文帝生于冯翊般若寺,由一女尼躬自抚养长大。在寄养尼寺期间,女尼曾屡谓此儿奇异非常,将来必得天下,重兴佛法。隋文帝也深信“我兴由佛法”,所以他给了佛教以种种的关心和爱护,在晚年甚至还曾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几乎尽废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而同时却颁舍利于诸州,营造寺塔多达五千馀所。同样,隋文帝在夺取北周政权之前,道士们也曾向他献计献策。如《隋书·律历志》云:“(北周静帝)大象元年,……时高祖(杨坚)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

像张宾这样因曾密告符命、积极为杨坚夺取北周政权作舆论准备而后来大受重用的,至少还有焦子顺、董子华等道士。总之,隋文帝在表面上虽以儒学作为治国之本,但由于他佞佛崇道,遂使儒学的实际地位反而处在佛、道之下。然而,尽管隋文帝在处理儒、道、佛关系上或有畸重畸轻,但在主张以儒学为立国之本的同时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希望建立起一个“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体系,却是他的一贯主张。隋炀帝杨广登位以后所推行的思想文化政策,也大致可看成是隋文帝这一“三教”并用政策的进一步施行。整个隋代的庄子学,就是在上面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着。

唐高祖李渊登上帝位后,也以儒学为立国之本。他下诏置州、县、乡之学,广揽士人,并于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亲事释奠之礼。但他又把儒学看作是与“老教”、“释教”并列的“孔教”,并于武德八年下诏重新为儒、道、释三教排定了序位:“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可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当然,把“老教”排在首位是有很多原因的。《隋书·经籍志》云:“(隋炀帝)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说明隋代后期对老子的崇拜热已经兴起。而李渊出身于关陇集团的武人世家,门第不高,颇为中原地区门阀士族所轻视,所以正需要与老子李耳攀宗,以便为自己夺取天下提供有利条件。当时的一些道士因看到李渊父子将有希望夺取隋朝的天下,便纷纷迎合了李渊的这一需求。如《混元圣纪》卷八云:“隋大业七年,辛未,炀帝亲驾征辽,楼观道士岐晖谓门弟子曰:‘天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后数年,隋果乱。”李渊正是利用这样的“符命”来为他夺取天下和巩固统治地位服务的,因而他自然把“老教”排到了第一位。也正由于老子崇拜热的不断升温,这又使人们对作为老子后继者的庄子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

唐初庄子学的向前发展。

与唐高祖一样,唐太宗李世民一登上皇位,便“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旧唐书·儒学传》)并云:“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慎所好》)但他并没有忽视道教的作用,也没有对佛教采取排斥的态度,所推行的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的“三教”共存的政策。不过,因出于神化王权的需要,他却诏道士处于僧尼之上:“朕之本系出于柱史,……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令道士在僧前诏》)他还令玄奘将《老子》译成梵文,使之流布域外。由于这些原因,兼以当时的统治集团又需要把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引入政治实践,所以阐释、研究庄子学说也就随之渐成风气。诸如魏徵的《庄子治要》、成玄英的《庄子注疏》等等,便是在此时或稍后问世的。

继唐太宗之后的几代李姓皇帝,他们在继续奉行“三教”并存政策的同时,又把对老子的崇拜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唐高宗李治曾于乾封元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旧唐书·高宗本纪》)。又分别于上元元年令“王公百寮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同上),于仪凤三年诏曰:“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其馀经及《论语》,任依常式。”(《旧唐书·礼仪志四》)唐玄宗李隆基对老子的一再加封和尽力神化,则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如他于开元十年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册府元龟》卷五十三),开元十九年诏“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天宝二年“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上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以上见《旧

唐书·玄宗本纪》)。正由于老子崇拜狂热的掀起,作为老子后继者庄子、列子等道家人物的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如:

(开元)十年正月己丑,诏……置崇玄学。其僧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列》、《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册府元龟》卷五十三)

(开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按,胡三省注云:“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

(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旧唐书·玄宗本纪》)^①

天宝元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新唐书·艺文志》)^②

(天宝四年,诏)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其余编录经义等书,亦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经》等,不须编在子书。(《册府元龟》卷五十四)

除此而外,唐玄宗还曾于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周易》、《老子》、

① 《唐会要·贡举下》亦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于元元皇帝庙置崇玄学,令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待习成后,每年随举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经考试。”

② 唐玄宗《加庄文列庚桑四子为真人敕》(《全唐文》卷三十六):“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列在真仙,体兹虚白,师元元之圣教,洪大道于人寰。观其微言,究极精义;比夫诸子,谅绝等夷。其庄子依号曰南华真人,文子号曰通元真人,列子号曰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曰洞灵真人。其四子所著改为真经。崇元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

《庄子》者^①，于开元末诏甘暉、魏包为《庄子》作注^②。总之，到了唐玄宗时期，庄子学已走向与国家政治的紧密结合，甚至由子学而上升为经学，成了王公大臣和一般士人都必须研治的一门学问。

可见，唐玄宗为了彻底消除武后、韦后大力扬佛抑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重新恢复李唐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不免对老子以及由老子所开创的整个道家进行了极力神化，使之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当然，唐玄宗并没有因崇道而忽视儒、佛二教的作用。事实表明，他在实施“三教”并行政策方面，实在比唐初几位李姓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他曾特为《老子》、《孝经》作注疏，又“亲注《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宋高僧传·玄奘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儒、道、释三教的和合融通。而且，唐玄宗为三教经典所作的注疏，其本身就几乎处处体现了这种和合融通的精神。如他在《御制道德真经疏释题》中说：“大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名其通生也。《庄子》曰：‘太初有无。’有无者，言有此妙无也。又曰：‘无有无名。’无名者，未立强名也。故《经》曰：‘无名，天地之始。’强名通生曰道。故《经》曰：‘有名，万物之母。’《庄子》又曰：‘物得以生谓之德。’德，得也，言天地万变，旁通品物，皆资妙本而以生成，得生为德。故《经》曰：‘道生之，德畜之。’则知道者，德之体；德者，道之用也。而《经》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也。然体用之名可散也，体用之实不可散也。……是知体用互陈，递明精要，不必定名于上下也。”这里，唐玄宗以佛教“体用无二”的思想阐述了老庄哲学中“道”与“德”的关系，认为像《道德经》虽然在表面上分为上经、下经，“先明道而德次之”，但由于“道”为“德”之本体，“德”为“道”之作用，所以二者表现为“体用互陈”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可分而为二的。同时，唐玄宗在《御制道德真经疏释题》中还通过

① 见《新唐书·康子元传》。

② 见《新唐书·艺文志》。

运用《庄子》书中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寓言故事,来阐述其关于儒、道二家完全可以互相融合而共佐王化的思想。唐玄宗在他的注疏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三教”合一思想,对当时和中晚唐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所阐述的“三教”合一理论,便是对唐玄宗注疏中“三教”合一思想的直接拓展和发挥。

“安史之乱”以后,儒、道、释三教和合融通的态势继续发展着,科举仍有以“道举”取士的^①,但由崇道佞佛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也随之日益突出,于是像吕温、元稹一些人便相继提出了重振儒学的主张,而韩愈还具体阐述了自己关于排斥释老、复兴儒学的思想理论。到了唐末,甚至更有李璣《广废庄论》的问世,这就把历史上评庄废庄的理论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层次。

第二节 隋唐庄子学的发展过程

隋朝建立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习尚和独特的思想文化仍较多地延续了下来。这表现在庄子学上,一是有一些人仍以玄学思想来阐释《庄子》,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梁澡《玄言新记明庄部》二卷当即属于隋代问世的此类著作;二是有不少人仍承因南北朝时盛行的《庄子》义疏之学,依据一定的思想原则对《庄子》的义理加以阐释、发挥和会通,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戴诜《庄子义疏》八卷和《隋书·何妥传》所载何妥《庄子义疏》四卷等等,当皆为隋时问世的《庄子》义疏著作。而陆德明著《庄子音义》三卷,既广集并审

^① 如《全唐文》卷四百八十四载有《道举策问五道》,当为唐宪宗元和间科举策问时所用。其中第一、二、三、四道,所提的皆为《庄子》中的问题。

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又复于这些旧音旧义之外自作音义,这不但继承了前人治《庄》颇重音义的传统,而且还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总结。至于陆德明敢于把《庄子》与儒家经典并列在一起,并在作音义时,于儒家经典“无烦纚缕”,于《庄子》则“微为详悉”(见《经典释文·序录》),这固然与他早年可能曾深受“玄言”影响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成是受隋时儒、道、释三教并行这一思想文化思潮影响的结果。

由于西晋郭象的《庄子注》所反映出的独特哲学思想非常适合于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他所裁定的三十三篇本子又显得颇为精纯,因而他所作的注解遂为世人所贵,他所裁定的本子也就几乎成了后人共同推崇的定本,陆德明即依郭象注本而作《庄子音义》。鉴于这种情况,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便“研精覃思三十[年]”,“依子玄(郭象)所注三十[三]篇辄为疏解,总三十[三]卷”(见《庄子注疏序》),成《庄子注疏》一书。大致说来,成氏在此书中确实较多继承了郭象《庄子注》的学术思想,但他又“称意而谈”,即按照自己对庄子学说的独特理解,大胆扬弃魏晋玄学家的有、无之辩,而每以佛教中观派的否定思维方式和“诸法皆空”的基本理论,对《庄子》全书作了痛快淋漓的阐释,从而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郭象的庄子学思想,而且也打破了东晋支遁仅以佛理诠释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局限,真正为以佛解庄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他对《庄子》中出现的“老聃”、“庄子”更按道教的信仰作了解说,这又为唐代的老子崇拜提供了不少理论根据。在疏解方法上,他十分注意从训释字词入手,进而对语句章节进行梳理贯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郭象“寄言出意”阐释方法所存在的不足。所以清四库馆臣说:“(郭)象注扫除旧解,标新领导,大半空言,无所征实,不免负王弼注《易》之累。元英此疏,则称意而谈,清言曲畅。至序文云‘庄子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县,师长桑公子,受号南华仙人’,殆出《真诰》之